

发挥红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

□ 郑 琼

红色文化既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更是推进伟大事业的动力之源。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优势，拓展乡村文化建设的视野，发挥红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助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

夯实党在乡村基层执政的根基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积累的，是彰显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人民性和时代性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是激励各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广大农村群众同甘共苦、建设美丽乡村、共创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

一要强化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文化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政治标识的红色基因，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红色文化的精髓，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不断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为民务实作风，赢得更深厚的政治认同。二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将红色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信仰、价值追求、精神风貌转化为精神动力，坚持抓党建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三要密切基层党群干群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增进群众感情，践行群众路线，掌握新时代做好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更好地密切基层党群干群关系，夯实党在乡村基层的执政根基。

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促增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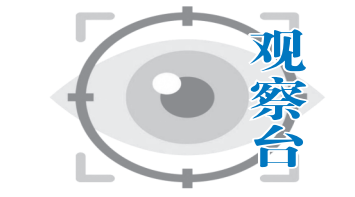
红色文化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传统和红色革命精神为

主线，集物态、事件、人物和精神为一体。红色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宝贵资源。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是促进农民增收和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一要做好顶层设计。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本质上是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树立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在空间布局、线路安排、产品研发、品牌形象等方面做到城乡统筹，营造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二要强化内涵挖掘。激活文化基因，注重内涵挖掘是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关键。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三要注重业态融合。发展乡村红色文化旅游产业要注重与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相互协同，打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新模式，推动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促进文化创意、红色教育、乡村民宿、观光农业等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同步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四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始终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为立足点和落脚点，鼓励农民以土地、林权、资金、劳动、技术、产品为纽带，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强化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完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乡村群众随着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稳定增收致富。

发挥红色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红色文化是伴随革命而产生、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优质资源，蕴含丰富的道德建设正能量。红色文化在乡村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要积极利用红色文化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结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任务要求，积极创建区域红色文化资源库、建设红色文化网络平台，让红色文化更好地融入乡村生活，引导乡村社会的价值追求。二要利用红色文化提升社会治理。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教化功能、创新功能与整合功能。要将红色文化融入到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中，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三要利用红色文化滋养社会心态。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讲，红色文化蕴含大公无私、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在乡村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存在自私自利、消费主义、骄奢浮华等不良社会心态，要依托红色文化培育公共理性精神，滋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打造具有红色底蕴的人居环境。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宝贵财富，也是打造优美人居环境的重要优势。一些分布在乡村的红色文化革命遗址等物化形态，寄托着乡村百姓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哀思，已经成为乡村精神的象征。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相得益彰，会增添美丽乡村的文化厚重感和生态灵性。一要做好资源普查。要在区域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布局中，普查红色文化资源，确定若干需要修复和保护红色文化遗迹，作为打造红色乡村的重要内容。二要做好村落规划。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三要打造红色公共空间。要科学规划村庄建筑布局，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民族特点。围绕红色革命遗址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既作为红色乡村旅游的重要节点，又作为村落的红色标识。



□ 王正攀

核心阅读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要建立城乡困难群众数据库，精准把握救助需求；建立医疗救助机制，为困难群众看病提供方便；大力培育社区慈善组织，为困难群众提供全面救助；建立社区心理抚慰机制，为困难群众排解消极情绪；建立社区互助与协同机制，推动社区救助共建共治。

定期救助，其他困难家庭给予基本生活救助。二是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科室的医疗机构开展合作，采取病患去医院就诊以及“家庭医生”主动上门等形式，给予“因病致困”家庭人员以医疗帮助或赠与部分必需药品等，帮扶城乡特殊困难群众。三是通过给“因病致困”家庭病患提供医疗救助，减轻其就医上的经济压力，进而逐步合理扩大医疗救助的保障范围，提高其保障水平。四是开展健康帮扶，实行“片医”制度，为社区困难家庭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和慢性病档案，为困难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办理免费体检卡，为其健康护航。

大力培育社区慈善组织，为困难群众提供全面救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在社会救助制度完善过程中，拓宽救助的深度和广度，亟须大力培育社区慈善组织。一是支持城乡社区慈善型社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搭建五级联动的城乡社区救助网络体系。该类型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于三部分：各级政府层面的支持、相关社会基金会的支持、市场主体的支持以及社会个体力量。二是鼓励已有的公益类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救助服务业务。既现有的社会组织如各地的老年人协会、爱心组织、心理援助组

织等在相应社区深耕多年，掌握社区家庭相关信息，开展社区救助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同时，建立相应公益类社会组织间的衔接、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协作救助特殊困难群众。三是培养、发展一支稳定的、有爱心的社区救助志愿者队伍和社工队伍。以基层社区为单位，在每个城乡社区发现、培养、发展社区救助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社工的选择以了解社区家庭信息的人员和有爱心的人士为主，负责收集、跟踪所在社区的困难家庭的信息，以及对其开展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帮扶。

建立社区心理抚慰机制，为困难群众排解消极情绪。在传统的社会救济、救助或帮扶中，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往往不被重视，而这也往往会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家庭遭遇困难，一般对个人心理、家庭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因此产生新的家庭矛盾。如果没有有效的排解方式、渠道，得不到及时的社会救助，容易对家庭、社会产生非理性的偏激认识，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所以，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必须建立心理抚慰机制。一方面，加强对志愿者队伍和社会工作队伍的心理服务培训，使这些人员在进行物质帮扶的同时，对有心理问题的困难家庭给予心理抚慰。另一方面，

在重点社区或有条件的区县建立心理咨询室，免费为有心理障碍或消极情绪的困难群众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心理疏导或情绪释放。同时，通过购买服务，让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服务的专业团队为有心理问题的困难群众提供心理服务。

建立社区互助与协同机制，推动社区救助共建共治。整合社区资源，以社区互助方式对特殊困难群众进行精准帮扶，不断创新社会救助工作的思路和途径。一是建立社区互助机制，营造互助友爱的社区精神。如，开展社区居民结对帮扶，建立由帮扶组、社区、居民代表等多方参与的问题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定问题解决方案，落实工作成效；鼓励困难家庭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增强困难家庭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培育社区互助精神。鼓励社区其他成员通过自我服务形式，解决社区困难家庭的问题，以互助来交流情感，营造团结互助的社区文化。二是建立社区协同机制，增强社区之间的互动性。社区之间针对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互动合作，医疗救助落后的社区之间可就医疗救助改进方面展开共创共建活动。社区之间还可搭建救助网络，利用网络使社区之间快速实现信息的交换，让附近社区的困难家庭和困难群众通过共同平台，得到快捷、便利的救助。三是建立跨社区救助组织，进行救助联合。跨区救助组织是由几个社区通过协同治理，自发成立或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的服务几个社区的常规性救助组织。它能有效地协调社区之间的救助工作，将信息、资源等进行集中整合利用，实现多主体高效的社区救助。跨社区救助组织要重视解决社区救助网络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减少多元互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为城乡困难群众提供专业救助服务。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做到三个结合

□ 刘士林

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时再次强调，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同时，针对此次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以应急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体系建设为重心的城市治理现代化重要性更加凸显。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相关，要统筹谋划和协同推进，实现两者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

与“社会治理精细化”紧密结合，更加关注城市治理中的“特殊需求”。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把“社会治理精细化”列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工作重点。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利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重点，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建设一批新型示范性智慧城市”。由此可见，智慧城市把“社会治理精细化”作为重点建设内容，顺应城市治理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需要。

总体上看，智慧城市以前关注的主要是“类”和“群”，把满足一般的、普遍的、必然的社会需求作为其规划建

设的核心，但对个体的、偶然的和特定情境下的“特殊需求”有所忽视。在此次疫情中，人们之所以感到智慧城市建设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主要是由于“普遍需求”与“特殊需求”的不对称、不协调的原因。从“类”和“群”出发，也是城市治理比较粗放、不易做精做细的主要原因。对于城市治理现代化而言，在发展理念上应在重视“普遍需求”的同时，把“特殊需求”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为各种偶然的和特殊的问题提供及时响应和服务，引领各种社会信息管理平台走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与数字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不仅是数字产业和人才最集中的空间，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最肥沃的土壤。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缺乏产业支撑的智慧城市，一旦建设资金出现问题，这些智慧城市只能被迫下马，成为新的烂尾工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生产要素，使数字产业的地位显著提高。据国家网信办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最新发布，2018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3。同时，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数据显示，数字经济还具备良好的吸纳就业能力，仅2018年就提供了1.91亿个就业岗位，占当年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4.6%。这两方面是所有城市都迫切需要的。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厚植经济基础，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现代化治理平台建设，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也可以为数字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提供广阔舞台。这种类型的循环还可以为开展智慧城市治理提供有益示范和参照。

与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密切结合，把数字政务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全球和中国的公共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公共安全本质上是一种新“城市病”，其根源同样在于城市人口的“爆棚式”增长和城市要素的过度集中。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又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负担最重。原因有二：一是由于重大活动多，因此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相对也高；二是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一旦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果和影响也极其严重。特别是经历了此次疫情的大考之后，把“全周期管理”意识挺在前面，防患于未然，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对突发事件采取及时有力处置等，正在成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尽快解决的重要课题。

数字政务是城市的“中枢系统”，在日常运行和危机处置中具有核心地位。截至2019年7月，数字政务已覆盖我国422个城市，涵盖1000多项服务，累计服务民众达9亿人次。毋庸讳言，仅能满足日常管理而无力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是一些城市数字政务在本次疫情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一是反应不够及时，与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交通等的联动性弱；二是基础设施服务能级不高、相关人员培训严重不足；三是缺乏跨部门协同、大数据共享的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提升我国城市治理的整体水平。为了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应把数字政务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机制最复杂、反应最敏捷、协调协作最全面上狠下功夫，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